

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李致重

(中国中医药学会, 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特邀教授 北京 100029)

中医学(以下简称中医)和西医学(即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这两种体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原理各是两种医学的核心,所以本文讲的中、西医,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

“通约”一词的原形,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与“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然后加以计算;接着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使其化简。近年来,学术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便说“两者可以通约”。当然,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

本文旨在说明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因此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来进行讨论。

一、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

1. 关于“科学”的含义及科学态度

“科学”一词的本意即“知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2. 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发展、变化的共同规

律,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对此,《易经·系辞上第十二》的说法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上与形下,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于是,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称“后物理学”),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它与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其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概括总结。

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多系形上类;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或分析性科学),多系形下类。

3. 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事实,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是物质的“运动”,或是运动着的“物质”。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眼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

物质的“运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即信息、状态、现象及它们的变化。社会、历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气象、物候、生态、生物进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

运动着的“物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具体事

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的特性,是一门极特殊的学科。人文科学强调人的自由与责任,即使是自然科学,现在也正面临着复杂性、非线性和小概率事件的挑战。心理现象则显得更为复杂。如果心理学尊重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就必须放弃分析科学处理简单性问题的传统方法,采取综合科学的整体方法,把人的心理看作一个演进式的复杂开放系统进行研究。

正是由于心理学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心理

学很难建立起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严格规范的定理公设式的知识系统,心理学硬要去套“科学”的“南柯一梦”,该醒了。真正的心理科学应该努力争取与复杂性科学一起成长,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去机械模仿近代科学处理简单性问题的模式。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逐渐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现在是把心理学从纯自然科学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蔡德诚)

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即可逐步达到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

在近代,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综合性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分析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作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

4. 关于“人”的定义

中国古代有浓厚的“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其实,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后经圣托玛斯·阿奎那认定的关于“人”的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理性”、“动”、“物”。除“理性”为人所独有外,其中的“动”,也是任何“物”无与伦比的。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立体”。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从和谐出发,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

中医理论的奠基巨著《黄帝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神明”为其“君主”,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不谋而合。

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这个有“理性”的“形上”的“动”着的“物”,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

5. 关于“近代科学主义”

18世纪以来,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也产生了一种“潮流性误解”。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局限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人的天性中局限的卑微相关。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并且,“科学”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因此在当代,人们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解释、改造、非议形上科学和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一再警示人们的“近代科学主义”。尽管如此,“近代科学主义”仍然占据着潮流,并引导着当今的“技术疯狂时代”。面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觉醒,在我们讨论中、西两种医学关系时,这的确确实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真诚面对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6. 关于“学科”的要素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借助语词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为此,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对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

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之学,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变化之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长寿,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治病。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因此,摆在中、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回答医学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

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的理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医学面对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活的整体状态的人,组织、器官属性的人,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

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

所谓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和病理的两个方面。中医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取的、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学中所说的“征候”。而生理性的状态,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时所见的表现。《黄帝内经》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态、候等,其实也是征候。故《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说,中医是以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

征候的显现,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其一,社会的安定与战乱,文明与落后;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饥饱劳逸、荣辱炎凉等等,都会在不同个体上塑成肉体和精神个体特性而表现在征候上。其二,自然的环境气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阴阳晦明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在征候上显现出来。其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爱好等,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及其太过、不及情况下的征候表现。其四,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盛衰强弱、既往疾病以及性别、年龄等,既决定了其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他在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影响下,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中医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以征候为联结点,使之融合为一体。其二,“征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质言之,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活的整体状态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征候的形上的特点,也就无所质疑了。其三,中医通过征候,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就是说,中医的征候,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都以各种不同的脉、舌、色、征表达了出来。其四,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在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像中医诊断那样,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动参与研究之中的先例。况且,中医的诊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为

“万物之灵”的双方的“理性”活动的高度配合。这就增进了征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述四个特点，奠定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也是中、西医相互间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就西医的生物医学而言，它一开始见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个机体。但西医的视线随之即往下走，从组织、器官水平到细胞水平，又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不难看出，西医生物医学最关注的具体研究对象，显然是形下属性的人，即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这与以“征候的人”为研究对象的中医自然是不可通约的。

需要说明的是，西医也讲症状与体征。但是，西医只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向导”，并没有作为抓住不放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至于体征，西医也只把它视为内在的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性反应，并没有在人的形上联系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医征候的特点。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西医也讲“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但是，心理和社会领域有显而易见的形上特征，而西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却又具有鲜明的形下特点。所以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个医学分支的关系。很显然，只要哲学与化学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医学中的心理、社会医学，将必然与其生物医学之间，只能保持着今天这种多元并存的关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约，结合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研究对象相对于研究方法，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譬如冶炼而成钢、淘沙以取金。因为是铁矿石与含金的沙，才分别地选择了“冶炼”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换。所以，人们不可能因为还原性方法或技术的发达，把它任意“拿来”解决逻辑学和哲学的难题；更不会用化学方法化合出信息，用解剖学方法打开“七情”。

第一，由于中医研究对象的形上学特点，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医的学习与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学。

形上学其实并不神秘。一般来说，形上学是“论有之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形上学是“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所谓万有，就是人们感知到的（包括暂时还没有感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我国古代讲的天、地、万物，佛陀讲的色、受、想、行、识，现代哲学定义中所指的自然、社会、思维，其实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全部把握的万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首先必须承认万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为的私欲偏情、卑微无知、狭隘武断、自立门户，只承认其中一部分“有”，而否定自己不愿意承认或尚未知道的“有”。当普遍确立了万有的观念之后，人们共同来研究万有的特性，就容易趋于一致，而减少门户之见或左道旁门之谬。

正是因为形上学是关于万有之有及其特性的

学问，因此形上学是一切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道、德、气、理是形上学，毫无割裂地把自然、社会、思维看作万有而总结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学。尽管至今形上学仍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承认“万有”，承认有共同规律支配着万有，并不断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学会用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就可以称得上掌握形上学的真谛了。

“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彰显着万物的投影。”所以，中医在学习和研究中，必须熟悉形上学的基本原理。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是形上学家，但起码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们在中医的研究上便获得了主动。

第二，中医研究的征候（状态），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所讲的信息含义相同。所以系统性方法将为中医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系统性方法是当代科研的最新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系统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调控的对象；控制则作为对信息进行存储、处理、调控的方式；系统论是对整个系统性方法原理的揭示。

在中医里，征候是活着的人表现出来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信息；各种治疗则是依据征候，察明病机，对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则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识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还原论与系统论、综合与分析，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所面对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随意置换的。比如，以水来说。用物理学方法看到的水，是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在摄氏零度时凝固为冰、100度时变为气态，四度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而用化学方法看到的水，则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假设置换研究方法，用物理学的眼光，如何能发现或理解日常所见的水，必然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呢？

数十年来，我们往往从近代科学主义的偏见出发，怀疑或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无视形上学和系统性方法，我们常常主观地用西医生物医学研究中习用的还原性方法，对中医、中药进行“研究”。虽代价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两种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四、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中医在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征候）的过程中，首先把人视为征候的人、信息的人，视为一个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整体系统。然后在形上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包含系统方法为内核的阴阳五行学

说,以综合—演绎的逻辑原则,把整体系统划分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以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气等名称命名。对于各子系统的职能,中医多以不同的“官”或“主”来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统有粗浅解剖的影子,但事实上,它是信息系统模型,是某一方面“职能主管者”的代名词。故中医称之为“藏象”,而非西医所指的“脏器”。恽铁樵在他的《群经见智录》中,称中医的五脏是“四时之五脏,而非血肉之五脏。”联系到现代系统理论,这“四时之五脏”,即人身整体系统内所包含的五个子系统,它是“天人相应之五脏”,或曰“天、地、人合一之五脏”。

再如中医的病因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归结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归结于内在的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的因素。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使正常的机体反应状态发生紊乱,于是形成疾病。在疾病过程中,中医把导致“善行而数变”(即变化多端)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导致“润下”、“沉滞”、“留连难除”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如此等等。这些病因是基于病理状态,借助“风”或“湿”的属性,演绎而来的信息性病因模型。它不同于西医的“致病因子”,也不同于自然界直观的风或湿。

人体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出现疾病状态,分析产生这种状态而认识到的内在本质,即称病机。它同样是一种信息性病机模型。它不是来源于按照逻辑实证论而设计的实验室指标,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这种信息性病机模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所以离开了医者和病者的共融现场,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营卫失和”、“枢机不利”、“心肾阳虚”、“肝阳上亢”、“脾虚湿停”、“寒滞经脉”……均是如此。它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实在的理性概括——具体的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应该说,它也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形上病理学。

又如治则与方药。中医的“论治”,是指根据辨证所得的病因病机,对疾病进行审因审机而采取的负反馈调节过程。“调和营卫”、“通利枢机”、“温补心肾”、“平肝潜阳”、“健脾燥湿”、“温经散寒”……皆是针对病机,从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则。用控制论的语言表述,即负反馈调节的决策。

用于治疗的方法或药物,是落实治疗决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难看出,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没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完全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至于口服的中药,它的确是包含多种化学成份的物质实体。然而,信息也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三大成分之一。自《黄帝内经》到今天,中药的性质是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来判定的;中药的功效是以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等标准来判定的。这些判定的依据,显然是关于信息的定性标准。所以中医临床的治则,如“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信守的不是药物中具体的化学成份,而仍然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标准。

讲到这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我们不妨作一种比喻。

被中医命名为人身“十二官”的脏腑,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中央各职能部门,因为它担负着整个国家某一个方面的管理职能。征候则相当于某一个,或某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出现失职或紊乱时的病理表现。病机则相当于导致这些部门出现病理表现的本质原因。治疗(包括治疗原则和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则是从整体出发,对有关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控的战略性原则和措施。那么,中医大夫呢?他便是总理,即每一位病人的总理。所谓“医者意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说的便是一个中医大夫要善于理性思维,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则他眼中有全局,紧紧地盯着境内、境外;心中有整体,明了他所管辖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状态;胸中有明镜,善于透过现象正确判断各部门的寒、热、虚、实;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全是他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决策。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功能健全了,用不着总理去参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废料处理等生产力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用不着担心钢铁够不够用、粮食够不够吃,照样可以实现财源不断、国泰民安的总目标!这就是中医——形而上医学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对于处在世界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来说,两者在基础医学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吗!

五、结束语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随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与骄傲。因此,形上学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学多元性遇到挑战。在医学界内,连人自己是什么几乎也成了大问题。“人是各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一架机器”,至今仍然是许多医家奉守的信条。这个时期,同样是一个“因热潮”而多梦幻、因“现代”而废传统的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着“有我无他”的排他性——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喧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医,其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无论如何,人类也正在开拓着一个文化、科学多元化的新时期。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缤纷的文化、科学殿堂。恰好在此时,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医,中医要走向世界,这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瑰宝,需要重新振兴的原因和机遇所在!

本文讨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希望处于“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而陷入“百年困惑”之中的中医,能尽快抓住机遇,找准自己的科学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两种医学,比作太极的两仪,那么,与其执其一而偏安,不如合以二而满全。“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人类医学,需要中、西医共存。

(责任编辑 蔡德诚)